

江山半壁 文人離亂

抗戰中的文人私事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這八年是
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為苦難的經歷

莊瑩
著

江山半壁
文人離亂
抗戰中的文人私事

莊瑩
著

江山半壁人離亂 ——抗戰中的文人私事

作者 / 莊 瑩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林千惠
圖文排版 / 邱澗誼
封面設計 / 秦禎翊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3年5月BOD一版
定價：28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目次

「我苦哉，我苦哉」

——周作人的「苦」及抗戰中的周家後院

5

鳴鳩曾占鳳凰巢？

——亂世鴛侶郁達夫王映霞的毀家詩紀

3
6

對照記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戰時歲月

5
8

獨為神州惜大儒

——抗戰中陳寅恪的家國之變

8
5

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巴金與蕭珊的八年「抗戰」

1
0
7

我有創傷君有淚

——《胡風回憶錄》裏的抗戰生活

1
2
8

那永遠學不盡的人生

——抗戰中的沈從文及其選擇

漂泊者蕭紅

——從呼蘭河到淺水灣以及眾說紛紜的愛情

「我的壽命是由天的了」

——林徽因、梁思成的顛沛流離與一世才情

2
0
8

1
8
3

1
5
8

江山半壁 文人離亂

抗戰中的文人私事

莊瑩
著

目次

「我苦哉，我苦哉」	
——周作人的「苦」及抗戰中的周家後院	5
鳴鳩曾占鳳凰巢？	
——亂世鴛侶郁達夫王映霞的毀家詩紀	3
對照記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戰時歲月	5
獨為神州惜大儒	
——抗戰中陳寅恪的家國之變	8
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巴金與蕭珊的八年「抗戰」	7
我有創傷君有淚	
——《胡風回憶錄》裏的抗戰生活	1
	2
	8

那永遠學不盡的人生

——抗戰中的沈從文及其選擇

漂泊者蕭紅

——從呼蘭河到淺水灣以及眾說紛紜的愛情

「我的壽命是由天的了」

——林徽因、梁思成的顛沛流離與一世才情

1
5
8

1
8
3

2
0
8

「我苦哉，我苦哉」

——周作人的「苦」及抗戰中的周家後院

關於周家的事，似乎無從說起。

如果非要找一個節點的話，將時間放在一九三六年吧。這年十月十九日，魯迅去世。

周家的很多事情，都是圍繞著大哥和二弟展開的。

往前數，一九一二年，魯迅隨教育部北上，一九一七年周家二弟北上。

一九一九年，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胡同購房，十一月二十一日，先與周作人一起搬進了新居。然後，於這年十二月一日魯迅啟程返鄉，接家人進京。

近鄉情怯，此情此景，魯迅〈故鄉〉寫是：「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

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魯迅帶走了母親魯瑞以及朱安。朱安帶走了一張娘家的全家福，自此和家人真成永別。朱安留給娘家的是一張魯迅的照片，這張照片拍攝於十年之前的日本。

就這樣，周家變賣了在浙江的房子，這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四日，晴。魯迅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一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屬，攜行李發紹興。」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家人來到了北京八道灣胡同十一號。

以後的故事要發生在北京了。

(一)

大先生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的很多了，還是從二先生開始吧。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周作人北上。此行是受蔡元培的邀約，前往北京大學任教，擔任希臘文學史及古英文課的教員。

而出發的當日，也恰是其叔祖周慶蕃的「五七」。周慶蕃字椒生，據錢理群所著《周作人傳》中記載，周作人是「因他之力而第一次逃出家鄉」。所以，周作人在離開故鄉北上的時候，感慨應該是很多的。多年以後，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憶錄》裏稱，自己的人生之途準備期已經

結束，由此開始了獨立的人生之路。

雖然周作人是受邀前往北大任教。但此時北大已經開課，此前所提及的課程早已無法開設。

權益之下，蔡元培約其先擔任預科國文作文老師。但這讓他「大為喪氣」。他當即想定在北京再玩幾天，然後回到紹興去。「也許在潛意識裏，他仍然擺脫不下故鄉的蠱惑」。六年之前，他還在懷疑自己思念日本，「豈人情乎」。

但他還是留了下來。蔡元培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周作人先臨時擔任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的一名編纂，月薪是一百二十元。到了這年九月四日，他正式收到了北大的聘書，他被聘為「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員」，月薪已是二百四十元。

這份薪水是很高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一年之後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為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與新民學會的張昆弟、羅學瓚、李維漢、羅章龍、蕭子升等二十四位青年一起到達北京。²此後，毛澤東當過一段時間的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月薪只有八塊大洋。

從一個旅日歸國的中學教員到北大教授。

周作人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

在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和周樹人一樣，是不可忽視的一員。

但在期間，兄弟反目，雖其原因一直為世人所分辨不清，但東啟明西長庚的永不相見成了現實。

在最終，他看到李大釗被捕被殺。繼而看到百姓對於革命者的被殺亦如其兄魯迅筆下的民眾一般。他看到在天津，革命者的被殺只是換來民眾對於「出紅差」的「大娘們兒」的興趣，也不過是「看她們光著膀子挨刀真有意思」。

最終，連他自己也與劉半農一起逃難到了日本友人的家中。錢理群在其《周作人傳》中說，「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難，記憶自然是十分深刻的」，「他終於在歷史的進退之間做出了新的決斷。——周作人的五四時代從此結束」。

(二)

關於周家抗戰時期的事，有些是應該從大先生的去世說起。

此前，雖然兄弟反目，但畢竟還是完整的一家人。有魯瑞在，大先生在，周家依然過得很安靜。大先生和二先生都是名流，也都很少提及對方。但北平與上海的來往是有的，特別是在錢的上面。

事情從一九三六年說起。這年十月十九日，周海嬰一早醒來，保姆許媽告訴他，「弟弟，今朝儂勿要上學堂去了」，「爸爸嘸沒了，儂現在勿要下樓去。」³

這天早上魯迅與世長辭。許廣平擁著周海嬰說：「現在儂爸爸沒有了，我們兩人相依為

命。」⁴後來發生的諸多事情，的確他們母子是在相依為命了。

魯迅的墓地選在了虹橋路的萬國公墓，這裏離宋家墓地比較近。棺木選擇的是「一口相當昂貴的西洋式棺木」。雖然後來又傳言說是這口棺木是宋慶齡出資贈與的，但周海嬰根據回憶斷定，「這棺木是自費購買的」。不僅如此，魯迅墓碑上的文字也是由周海嬰來書寫的，原因是許廣平告訴他，「爸爸的墓碑，誰寫都會受到牽連，你是兒子，又是孩子，他們抓不到把柄的。」

雖然墓碑由周海嬰來寫避免了別人的牽連。但是在這塊墓碑之上，有魯迅的燒盜頭像，在抗戰期間，這個頭像不翼而飛，並且敲的仔細也很有技巧，「沿臉孔周圍用細槌擊鑿，正好是當中面容那部分失去了，四周卻沒有大的裂痕，不像有人因洩恨而猛力打擊，或者被頑童以石塊敲砸所致。是行家裏手小心翼翼地把整個盜像面部取走了。問題是這樣做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如果從善意分析，也許是為魯迅墓的安全著想，以此掩人耳目，才費了這番苦心。母親在一篇文章裏，依據那時的世道人心，有過上述的猜想。」⁵後來，市面回復平靜，這畫像又被複製了一塊放在了碑面上。

關於魯迅之死，似乎就到這裏。但魯迅和周建人兄弟都是飄零到上海之人，他更大的後方應該在北京，按照道理，作為大哥的離世，北方總應該有所反應才是。

反應總是有的。

消息最先傳到北京的周作人那裏，是三弟周建人發的電報。雖然此前兄弟勢如水火，但兄弟

關於牆外禦其侮的道理他們還是懂的，生死面前，一切都顯得不重要了。

更何況，後來的資料顯示，其實兄弟倆個一直都在彼此關注，只是很少發言而已。

比如，在一九三六年初，北平和天津的文化界名流共一百零四人共同發表了一份宣言，《平津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書》。這份名單中沒有周作人的名字。魯迅對周家老三說起老二「對於救國宣言這一類事，連錢玄同、顧頡剛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他的名字。我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題目時，亦不可過於後退……」。

不僅如此，魯迅還對人說起二弟，文人之中讀書的是自家兄弟周作人最多最好；周作人的書是不用審稿就可以出版的，「莫非啟孟的稿子，還用得著校嗎」……如此種種，足以見得，作為哥哥的，對自家弟兄的動向還是極為關心的，雖然他們表面上看來已經老死不相往來。

根據李伶伶在《周家後院》中的描述，「周作人這個一貫平靜得近乎冷漠的傢伙，懷揣著報喪電報，依然按部就班的去學校上班。大概他想，不能因為家務事而放學生的鴿子，即便課是上不去，總也得去打個招呼。來到學校，走進課堂，他宣佈：今早家兄不幸在上海病逝，不好意思，對不起了，今天的課不上了。」

他離開學校之後，去北京圖書館找到魯迅在紹興的學生宋琳，回家報喪。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魯瑞倒沒有哭，「不過兩腿發抖的厲害，簡直不能獨自舉步了」，這應該是最大的悲痛，否則也不會在四天之後的二十二日跟孫伏園說「論壽，五十六歲也不算短了；只

是我的壽太長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什麼也不知道麼？」

周作人沒有參加魯迅的喪禮，他表示由三弟周建人代勞，「他和家嫂都不會去上海」。周作人和朱安都沒有提及許廣平，「不過，朱安不提，也是一時疏忽，不會是刻意，因為他沒有那麼多腸子拐彎；周作人不提，是可以的，他從來只認朱安這一個大嫂，至死也沒有承認許廣平是他們周家的一份子。」

作為妻子的朱安也是沒有參加魯迅的葬禮的，因為她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去參加。在當時，朱安已經四年沒有見過魯迅，「她只是從二先生那裏瞭解丈夫的死訊，那還是沾了婆婆的光。如果婆婆不在，誰把她當回事，誰會在第一時間將噩耗通知她這個久已在事實遺棄中灰飛煙滅的正牌夫人？」再者，她甚至沒有接到邀請她赴滬參加葬禮的信函。

於是，上海的一切都由周建人和許廣平代勞。在上海萬人送別魯迅的隊伍中，少了周作人及朱安的影子。

但有一點是要注意的，周作人在接受《大晚報》記者採訪的時候稱，「（魯迅）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內山書店的人知道以外，其餘的人都很難找到。」這句話為後人所懷疑，「不免想像力過於豐富和誇張了」，「他好像去找過而沒有找到似地」。

而根據周海嬰日後的回憶，當時魯迅在上海的住所的確如周作人所說的那樣，極為隱蔽。「那時白色恐怖瀰漫，國民黨反動派視一切進步文化人士如眼中釘，父親自然受到的威脅更大，

因此他的住址對外保密，結交的朋友除非關係特別者，都儘量約在外面或在內山書店會面」。但是，魯迅的住址是否對周作人保密，那就不是外人所知道的了。

魯迅在上海受到生命的威脅後來得到了證實。一九九二年，沈醉告訴了當時同在全國政協第四四組的周海嬰一個「從沒透露過的秘密」，那就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沈醉曾經奉命成立了一個監視小組暗殺魯迅。但後來由於魯迅的聲望沒有動手。

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就不能不小心。當時，魯迅與柔石、馮雪峰交好，「後來柔石被捕，國民黨進一步搜捕，風聲很緊，魯迅就攜帶全家人到花園莊避難。中間似乎還在內山先生家裏住過一夜。等到稍稍平靜一點，魯迅回家，看到門口釘了一塊木牌，上寫『鎌田誠一』，大概是內山先生出於好意，利用這種方法，藉以掩人耳目的。魯迅立即拆下，收藏起來」。¹⁰

柔石被捕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鎌田誠一」木牌也發生在那個時期。與之相對應的是，同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局勢稍有波動，信子就把八道灣門上的「周宅」門牌摘下，換上「羽太寓」的門牌，甚至乾脆掛上日本的國旗，表示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卻安然自得。祖母為此歎道：「八道灣裏只有一個中國人了。」

魯迅死在了一九三六年，免卻了此後的下水、抉擇、站隊，乃至於那個著名假設所能產生的情況。

但他的家人卻都面臨了。